

前 言

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爱国人物众多。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古代，“爱国”一词也有着特定的涵义。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爱国先辈，都为保卫祖国的独立与主权、维护民族的荣誉与尊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今天，我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历史上的爱国先辈，讲述他们的爱国事迹，歌颂他们的爱国品质，学习他们的爱国榜样，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为此，我们编写了这一套《中华爱国先辈故事》。

《中华爱国先辈故事》共分六册，其中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各两册。本书是第四册，叙述了近代后期主要是辛亥革命期间二十五位爱国先辈的动人故事。他们中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民国元勋黄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和喻培伦、“鉴湖女侠”秋瑾、甘当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为议会民主献身的宋教仁、上将军蔡锷、会党豪杰马福益、中国第一位飞行家冯如以及状元实业家张謇等。通过

阅读这些故事，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热爱伟大祖国，崇尚民族气节，立足今天，展望未来，为社会主义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刻苦学习，作出贡献。

这套书是依据历史事实资料编写的，仅在细节上作了一些艺术加工。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出。

目 录

前 言.....	1
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	1
杨儒力拒沙俄.....	9
陈天华警世献身.....	17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30
民国元勋黄兴.....	53
不屈的斗士和学者章太炎.....	70
邹容甘当革命军中马前卒.....	85
会党豪杰马福益.....	96
鉴湖女侠秋瑾.....	106
徐锡麟安庆起义.....	120
甘为变革流血的禹之谟.....	130
赵声忧国从戎.....	142
“炸弹大王”喻培伦.....	152
林觉民碧血黄花岗.....	161

詹大悲组织汉口军政分府·····	168
吴禄贞反清沥血·····	176
为议会民主献身的宋教仁·····	190
二次革命先锋李烈钧·····	203
上将军蔡锷·····	218
朱执信悉心传播革命思想·····	228
终生追随孙中山事业的柏文蔚·····	236
状元实业家张謇·····	247
中国第一位飞行家冯如·····	257
詹天佑造铁路·····	265
“叫旦之鸡”林纾·····	277

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

奇特的礼仪

汉口前花楼街离英租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很短的弄堂，叫宝顺里。那里虽然属于中国地界，但房屋是一家洋行买办的产业。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间，这条弄堂里四号的楼上，几乎天天聚集着很多人。房间很大，约有六十平方米。里面灯烛辉煌，进屋的人都要行一种奇特的礼仪：头插野雉尾，足蹬一只靴，手舞足蹈，作着种种手势，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还将一只雄鸡砍去脑袋沥血。

这种情况，在外人看来很觉可笑，但是他们却个个神情严肃。原来，这幢房子是自立军领导人唐才常住的，来人都是自立军的成员。他们把这种礼仪称作“开堂”，也就是集会开始的意思。几天来，这里几乎老是在开堂。

这天开堂后，唐才常坐在正中，严肃地扫视了满屋的成员，激昂地说道：

“兄弟们！事情危急了。与其我们被他们制服，不如我

们先发制人。现在我决定，汉口自立军于二十二日准时行动！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先夺取汉阳兵工厂，从那里取得武器弹药，然后渡过江去直奔武昌，拘禁统领（清末新军中统率一协的长官，相当于旅长）张彪、关元恺和督抚……”

唐才常的话一停，屋子里出现了一片应诺声：

“好！二十二日，准办！”

“嗨！不能再等啰！我看是得动手！”

“行啰！”

会散后，成员们各自离去。可是，唐才常的心里还挂着千头万绪。行动迫在眉睫，事关国家兴亡大事，处境却异常困难。今天的决定，是迫不得已才作出的，可说是破釜沉舟之计。是成功还是失败，还很难预料。他是十万自立军的领导人，在采取这种大的行动之前，尤其需要他仔细和冷静……

投入维新运动

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唐才常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乡塾教师家庭。他小时候随父读书，七岁时就会作诗，十岁后就粗通经书了。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应童子试，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都名列第一，成为当地少见的才子。以后，他应四川学政的邀请，到他那里担任阅卷和家馆教读。不久，又进武昌的两湖书院就读。

然而，甲午战争的炮声和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使唐才

常再也不能过宁静的读书生活了。那时，张之洞力主毁除《马关条约》，重新开战，同时攻击李鸿章割地求和，并请求朝廷杀李以谢天下。所以唐才常对张之洞的胆识和勇气十分钦佩，盛赞他“直言敢谏，一时无双”。谭嗣同是唐才常的同窗好友。他们一起研究学问，议论时政，觉得要使国家强盛，必须改革旧习，实行新政。爱国热忱和维新图变思想，把他们紧紧地联合在一起。

一八九六年，唐才常返回长沙。当时，甲午战败所酿成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势头上。他对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的变法充满了希望，积极地参加教育革新活动。

第二年，唐才常担任了宣传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的总撰述。这份报总共出了四十五册，其中许多文字出自唐才常之手。他着力介绍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历史、外交和实业，诱导知识界人士抛弃八股旧学，转向新学。不久，唐才常又担任湖南最高学府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他积极宣传维新思想，从事于完全不同于旧书院的教学，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一八九八年夏秋，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后，接连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修路开矿、奖励科学、办报纸、兴学堂等等除旧布新的政令。谭嗣同也被光绪帝录用，这使唐才常受到鼓舞。不久，谭嗣同从北京来电，邀请他去北京从政。

这时，唐才常的救国革新思想已经成熟，那就是拥戴光绪皇帝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科学，走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

的改革道路。他满以为迎接他的将是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因此欣然前往北京。

但是哪里料到，他刚到汉口，就传来了恶耗：慈禧太后和荣禄、袁世凯等在九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紧接着，逮捕和杀害了谭嗣同等六位维新革命者，康、梁被迫流亡海外。消息传来，唐才常仿佛觉得自己从希望的高峰一下子被推进了冰窟窿里。他本想进京收葬谭嗣同的尸体，后来听说骸骨已经南下，便折回湖南；料理好家务后，马上去上海筹划下一步的行动。

在上海，唐才常与人进行了磋商，接着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他联络了流亡海外志士、侨胞、留学生和外国友人，准备推翻慈禧的统治，帮助光绪重新执政。

一八九九年夏天，唐才常第二次出国。秋天，在日本会见了孙中山。那时，孙中山正密谋发动武装起义，唐才常曾和他一起商议过这件事。这时他已经认识到，要拯救中国，扶光绪复位，用温和改革的方法是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依靠军队，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经过和孙中山的磋商，他初步确定了在长江沿岸起事的方针，并选择了新思潮、新风气比较开通的湖南、湖北地区作为突破口。

为了进一步落实行动，唐才常在这年十一月，返回祖国。次年初，他在上海筹建了正气会。正气会的宗旨是“纠合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共图救国之策。实际上，他是在联络豪杰，发展武装，准备起义。

为了更好地吸收江湖任侠的会党力量参加武装起义，

他又在三月间将正气会改为自立会，同时仿照当时会党组织的办法，建立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以此联络会党成员。“富有”是富有四海的意思，“富有票”是自立会的入会凭证。凡是入富有山堂的，都发给富有票。

在自立会的旗帜下，短短几个月里，唐才常印了三十万张富有票，实际发出的有十万多张。这就是说，已有十多万成为自立会的成员。一支庞大的队伍终于建立起来了。

为了准备组织新的政权，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张园召开了“中国议会”，并邀集了几百个社会名流参加。这是唐才常对他憧憬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预演。他希望起义事成后，就以它为议政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唐才常创建了自立军。这是他为起义作的最后准备。他以汉口为中心大发富有票，又让他的同志们分地段开设旅馆，作为接纳集合会友的场所。这样，自立军人员开始集中起来了。

自立军组建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在汉口英租界的李慎德堂，建立了机关部；唐才常住的宝顺里，也成了活动的据点。

除了会党成员外，唐才常还争取了当时的新军和在朝的官员。张之洞是湖广总督，唐才常一直把他看成恩师，对他寄予希望，准备在起义后，拥他来实行湖南、湖北地区的独立；对此，张之洞没有拒绝的表示。

破釜沉舟的决定

一九〇〇年八月间，局势到了关键的时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到西安。这是难得的好时机，唐才常决定以汉口为中心，组织自立军五路并举，进兵西安，拥光绪复位。

八月九日，大通的起义军张贴布告，首先发难。起义军民乘船而下，进攻大通盐局，大通水师的炮船应约响应。起义军轰毁了盐局，夺得了八只炮船，一举占领了大通。不料，汉口方面没法行动。原来，那里的自立军在焦灼地等待海外康有为的汇款。唐才常只得下令延期到八月十三日行动。可是到了那天，汇款还是没有收到，他只得再下延至二十三日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大通的起义军成了无援的孤军，结果失败，而这又牵动了武汉的局势。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起义部队都要粮、要饷、要军械，使唐才常如坐针毡。他清楚地意识到，康有为的汇款已无指望。再等，等来的将是什么呢？于是作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提前于八月二十二日行动。

唐才常仔细地考虑了行动的每一个环节，又筹划了行动前一天要做的事：向在汉口的各国领事及外国人发出公启，发布自立会宣言，表明兴义兵、革新中国的意旨……

决心为国捐躯

出乎意外的是，二十一日晚上，汉口都司陈士恒拿了经英国领事签了字的捕证和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大令，带着兵丁，突然包围了宝顺里。原来，张之洞已完全投向清政府，反过来向自立军下手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唐才常的同乡、随从李荣盛立刻催促唐才常说：“先生，快跑，我掩护你！”

唐才常神态自若地说：“我已决心为国捐躯，你自己走吧！”

李荣盛顿时急得流下眼泪，连声喊道：“还来得及，先生快跑吧！”可是，唐才常还是不走。

李荣盛被唐才常的牺牲精神深深感动，擦着眼泪道：“先生宁愿舍身，我李荣盛也不怕死！”

这时，清兵已开始冲进四号。自立会的中军管带李生致是位武秀才，他把守着楼梯，不停地用桌椅板凳向下扔去。

陈士恒闪在楼下门边，逼着部下由楼梯向上猛冲。李生致对准冲上来的兵丁，一脚一个踢得他们滚下楼去。可是，兵勇还是不停地往上冲。

“杀下楼去啊！”李生致突然大喊一声。楼下的兵勇，摸不清虚实，吓得往后退缩。李生致抓住这一眨眼的时机，跳上隔壁晒台，飞身从屋上逃脱。

清兵蜂拥而上，很快将唐才常等十一人抓住。

“把他捆起来！”陈士恒高声喊道。几个兵丁马上拿出绳子上去捆唐才常。

唐才常冷笑一声道：“事情既然败露，我准备一死。你们也不必捆缚，我与你们一起去就是了！”

陈士恒见唐才常身材魁梧，怕他逃跑，还是命令兵丁将他捆了个结实，然后押走。

由于唐才常的被捕，自立军起义就此夭折。第二天凌晨，唐才常在武昌英勇就义。之后，各地自立军也相继被镇压。一时间，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杀害。

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虽然还未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然而十多万自立军战士是杀不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吸取了血的教训后，很快地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

杨儒力拒沙俄

奉命出使俄国

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处在十分危急的境地。东北的大块土地，几乎已被沙俄吞进口里了。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帝国主义在和清政府谈判条约时，乘机提出极苛刻的条件。但奇怪的是，一向穷凶极恶的沙俄，在谈判中态度却比较缓和。为此，束手无策的清政府要求它从中起调解作用。

这一下，正中沙俄的下怀。原来，沙俄在谈判中装得比较缓和，目的是想攫取中国的东北。

自从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新疆的一大片土地后，沙俄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更大了。一八九六年，它和清王朝订立《中俄密约》，取得了中国东北的筑路权；一八九八年，又强占了旅顺和大连。现在，它又乘八国联军进攻之机，由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出动十七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

清政府连京城也被外国军队占领了，一时哪有力量和沙俄抗争？只好命令驻俄国公使和沙俄当面进行交涉。

当时，驻沙俄的公使名叫杨儒。一八九二年，他就以四品卿衔出任驻美、日、秘鲁三国的公使；到一八九五年，又改任驻俄、奥、荷三国公使。两年后升为工部侍郎，仍驻在俄国任外交代表。所以在清朝官员中，杨儒可以算是一名资格较老的外交人员了。加之他在任驻美、日、秘公使期间，曾为排华问题和美国办过交涉，所以有些与外国谈判的经验。

杨儒任驻俄国公使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行动非常不便。但是他爱国之心不减当年，头脑仍然非常清楚。奉命出使俄国后，他立即准备与俄国官员进行谈判。

谁知谈判还未开始，杨儒就从英国《泰晤士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沙俄已与清政府订立《奉天（相当于今辽宁省）交地暂且章程》。这一章程规定，沙俄可以在奉天府（今沈阳市）派驻“总管”，清朝的奉天将军要办重要的事情，必须通过他。驻守奉天的中国军队要撤出，军火要交出，炮台和火药库都要拆毁。俄国的军队则要留驻奉天，中国还得向这些俄国军队供应住房和饮食。

杨儒看了这消息后气愤极了，心想，按照这样的章程，中国东北的主权不是全交给沙俄了吗？气愤之余，他又冷静地作了分析：朝廷既然要自己和沙俄交涉，为什么不把这样重大的事通知自己呢？如果真有这样一章程，那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办交涉呢？因此他尽管一时还不了解实情，但对这章程有了怀疑。

初次交锋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俄国军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后，将盛京将军增祺软禁起来，迫使他派人到旅顺去谈判交出奉天。增祺身不由己，只得派已经开革的道员周冕去旅顺。周冕一到旅顺，沙俄代表就把一份早已拟好的章程放在他面前，迫着他在上面签了字。对这件事，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根本不知道。杨儒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心里有了底。他抱定宗旨，一定不能承认这个章程，并且要把将被俄国吞进口里的东北土地夺回来。

第一次谈判开始了。果然，沙俄代表、财政大臣维特把这个章程提了出来，而且宣称，杨儒应首先奏请清政府批准这一章程，然后才能谈判正式条约。

杨儒当即回答道：“这个章程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国方面决不能接受。”

维特仍强辩道：“这不是侵犯中国主权，而是保持中国自主。”

“既然是保持中国自主，为什么兵权、官员的任命权等都不在中国人手里？难道东三省不在中国版图之内吗？”

“不管怎样，这章程已经有中国官员签字了，中国政府应该批准！”

“签字的人是个已经开革的官员，没有权力签署这样重要的外交文件。”杨儒早已估计到这一点，沉着地回答道。

“况且，他签字时并未请示，政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这样的章程是完全无效的，必须作废！”

维特要先批准章程，杨儒则要求废除章程，双方针锋相对。由于杨儒的理由充足，维特无法坚持，最后只得同意原来的章程“姑且作罢”，另外订立新的条约。

初次交锋顺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清政府也很高兴。一九〇一年初，正式任命杨儒为谈判的全权大臣。于是，谈判进入了订立新条约的阶段。

一开始，沙俄方面仍然采取进攻的姿态，由维特口头提出了新条约的十三项条款。接着，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一份书面草案，将条款改成了十二条，但内容和维特提出的一样。双方还没有正式讨论，俄国代表就声称，他们提出的条款，细节可以商量，但大的宗旨不能更动。这等于是迫使杨儒接受他们的条件，没有讨论的余地。

杨儒仔细研究了这些条款后，发觉它们和原来的章程字面上曾有更动，但实质内容并没有变动，所以在谈判中毫不退让。维持和拉姆斯道夫忽而硬压，忽而哄骗，杨儒一点也不动摇，而是按照事先的考虑，对俄国提出的条款逐条加以批驳。几次谈判后，拉姆斯道夫懊丧地说：“所有的条款中没有被他批驳的，只有交还东三省这一条了。”

此后，俄国方面又要出了新花样，把十二条改成了十一条。拉姆斯道夫蛮横地声称，“这次条款的内容，是经过我们沙皇核准的，就是定稿，限你在十五天内签字。”

杨儒看了这份草稿，发觉其中虽然删去了一些刺眼的

字句，但侵犯中国主权的实质没有改变，因此还是坚持不签字。

三天过去了，沙俄外交部派人来威胁说：“条约草稿不能再改动，签字期限亦不能延迟，中国只能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

又过了三天，杨儒仍不签字。沙俄外交部又派人来逼迫道：“期限越来越近了，如果到期仍不签字，以后就谈不上两国友好了！”

沙俄不断地逼迫签字，杨儒却一再拒绝签字，要求继续谈判。拉姆斯道夫借口公务繁忙，拒绝会见；送去的备忘录，也都不经拆阅，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杨儒转而去找财政部和陆军部，但同样遭到拒绝；甚至递交光绪皇帝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笔信，也被拒收了。很明显，这不是拉姆斯道夫个人的行动，而是沙皇政府逼迫杨儒就范的有计划行动。

这时，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仍然胆战心惊，一时拿不出主意，又没勇气坚决抵制沙俄的要求。他们接到沙俄蛮横无理地逼迫的报告后，赶紧打电报给杨儒，表示“势处万难，不能不允”，要他“酌量画押”；但究竟如何处理，还是要杨儒“自行定计”。

坚持就是胜利

这一来，杨儒肩上的压力可大了。政府虽然有定见，但